

對佛教的分析要實事求是

——評郭朋的幾本書

四、宗教社會學研究

郭朋先生近年來連續出版了他的幾本書「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和「漢魏西晉南北朝佛教」。短短數年間寫出這一四〇餘萬言的四部煌煌巨著，可見郭先生治學勤勉，精神可嘉。然捧讀之餘又未免令人失望。郭先生幾輔的寫作旨歸，正如他在「隋唐佛教」前言裏所說，只是為了「使人們了解到，和任何宗教一樣，佛教也確實是封建統治階級御用的一種思想工具」。

也就是說，他的四〇餘萬言不過是用來論証佛教的階級性。事實上，郭先生的幾本書裏除了成篇累牘的資料堆積之外，屬於他本人研究心得的也就是這點東西。這裏暫且不論其學術價值如何，僅就其論証方法提出若干不同意見，以俟方家指正。

郭先生認為，小乘佛教產生於古印度的奴隸制社會，它就是反映奴隸之階級願望，維護和代表奴隸之階級利益的。大乘空宗出現在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代，它就是反映沒落的奴

隸主階級的思想情緒的。大乘佛教的其他派別形成於封建社會，因此，就是反映封建階級的思想和願望，為封建階級的利益服務的。（見「隋唐佛教」第三一四三頁）從這一先驗的觀點出發，然後他派定小乘「我空」是對奴隸們講的；「法有」則是奴隸主留給自己的；「善惡報應」既是用來美化自己，又是用來嚇唬奴隸的。至於大乘空宗，在郭先生的書裏，除了用「唉！全完了！」這樣一句俏皮話說明它是奴隸主階級幻滅情緒的流露外，並沒有指出其代表著甚麼樣的具體利益。甚至有時候「法空」又突然變成了「新興」封建階級的東西。他說因為這個階級「還沒有那種世紀末的沒落感，認為它的事業還是方興未艾，來日方生」，故「並不象奴隸主階級那樣害怕講『法空』」。（上引書第三六一三七頁）真讓人有點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對於大乘其他派別為甚麼是封建階級意識形態，郭先生並沒有從宗教思想上展開論証，而只是舉了佛經所描繪的菩薩「形像」象個「地主老財」，於是就斷定它是封建意識形

態。天下哪有這樣做學問的？稍有佛教史知識的人都會知道，佛教產生之初並不是當時社會的統治思想，而恰巧正是對當時統治思想——婆羅門教的挑戰，原始佛教「衆生平等」的思想正是代表

同地區人們的思想成果。因此，對佛教進行分析，這非判它一個某某階級的工具那麼簡單。

了當時人民羣衆對種姓制度的不滿，代表了被壓迫，被剝削者的思想與願望。第二，即使佛教成為一定時代的統治思想之後，也不等於說它就完全是純粹的統治階級思想了。在佛教這樣一個龐大的思想理論體系裏，也必然存在某些人民性的東西，即反映人民羣衆意去、願望、情緒和要求的因素。這就涉及郭先生的第二條論據：因為歷代封建統治階級都扶植利用佛教，所以佛教就是他們的御用工具。我們並不否認封建階級扶植和利用佛教的事實，但這並不一定能說明佛教本身就是一種統治工具。在中國歷史上，同樣也存在着封建統治階級限制、反對、甚至打擊佛教的事實，但我們也並不因此就說佛教一定不能成為統治階級利用的思想工具。在這裏，封建統治階級是主體，佛教是客體。是否利用佛教，取決於主體，而不在於作為客體的佛教本身。況且，統治階級可以利用它，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同樣也可以利用它。在中國歷史上，農民羣衆就多次利用佛教發動起義，例如，北魏天監十四年曾有沙門法慶領導的大來教起義；隋大業六年曾有號召「彌勒」的數十起義羣衆殺進東都洛陽；元末韓山童的「天下大亂，彌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相號召，點燃了全國性農民大起義的烈火；時代從永樂年間唐賽兒起，就不斷有人利用白蓮教（佛教之異端教派）組織農民起義。這就說明在佛教這個龐大的思想體系中確實存在某些適應被統治階級需要的思想成份。例如，佛教的平等思想與農民的平等要求，佛教的「無常」思想與農民的改朝換代的政治要求就是相通的。但我們也並不因此套用郭先生的邏輯公式，從而出得，「佛教本身就是一種農民階級的鬥爭工具」之法論。佛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思想理論體系，它既包容了各種不同的思想素材，又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和演變融入了不同時代不

郭先生的第三條論據是從「無量壽經」對於「極樂世界的描繪」，得出結論：如此豪華的生活條件，只有最高的封建統治者才能享有。因此，這個「極樂世界」完全是按照封建帝王的「經驗世界」設想出來的，它是封建帝王的現實生活的「彼岸化」；因此，佛國淨土只是替封建帝王們設計的理想國；因此，佛教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見上引書第六二一一六二四頁）。對此人們不禁要問：難道對彼岸世界的向往僅僅是為統治階級所壟斷的嗎？難道苦難中的人們就不能對死後的幸福生活產生憧憬嗎？難道他們想像的幸福也只能是現實世界裏經驗的「屋不遮天，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嗎？恰巧相反，正是由於人民羣衆歷盡了人間的辛酸，才使他們把對幸福和美好的一切想像與理解，投射到宗教的物質財富，七寶莊嚴的宮殿樓觀，「衆寶妙衣」，「百味飲食」……在現實世界裏都被強權者霸佔了。他們才想像於彼岸世界自己也能得到一份。因此，恐怕很難得出結論說，佛國淨土裏封建階級為自己設計的理想國。順便說一句，郭先生治學有二個特點：一是先驗主義，二是實用主義，往往不是從材料得出結論，而是從固有的結論去搜羅材料，分析材料。例如，他斷定大乘佛教的「涅槃」乃是封建地主階級那種驕奢淫佚生活的來世化，彼岸化；而這樣的佛教，則是封建地主階級的階級性的普遍化，神聖化。說是「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其實首先是（主要是，只是）封建地主階級才能具有這樣的「佛性」。（上引書，第七七頁）話雖說得錚錚些，可是我們始終未見他拿出根據來解釋一下何以如此。

份。據說，隋唐時代許多知名和尚出身於地主家庭。因此，「更

加表明了佛教思想的階級性」（上引書第七〇頁）他在論及宋代度牒制度時，更進一步發揮了這種理論：「度牒的價格如此昂貴，實得起度牒，從而能夠取得『宮度』身份的人顯然不是來自貧窮家庭。從而可以想見，那時的出家僧人的社會身份是非同一般」。「從它上面既可以看出佛教賴以『弘傳』的僧侶們的社會地位和階級屬於；又可以看出這些僧侶們所『弘傳』的佛教的階級屬性和社會作用」（見「宋元佛教」第二六頁）。這種以部分僧侶的「血統論」來定佛教階級屬性的論証方法是否形而上學，可以暫且不論。問題是這種僧侶地主在封建社會數百萬的佛教徒中究竟是多數還是少數則不應該含糊。倘宋代佛教僧侶都要買一張價值十幾萬至幾十萬的度牒才能出家，恐怕佛教也早已絕跡了。以個別推及全體。以特殊代替一般，這種治學方法顯然是不足取的。就是在論及特殊與個別時，郭先生也是援取了「六經注我」的實用主義辦法。比如禪宗六祖慧能家境貧苦，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對於他這樣一個出身微寒，目不識丁的和尚，成爲禪宗始創人，郭先生是這樣解釋的「作爲禪宗一代祖師的慧能，出現在中唐時期的舞台上，不但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特大的宗教宣傳，而且還是一種活生生的宗教見証啊！」（見「隋唐佛教」第五二三頁）。但是恐怕唐代佛教徒皈依宗門時不大可能調查慧能的家庭成份吧！那麼，選中慧能的「歷史」又何以進行特大的宗教宣傳和活生生的宗教見証呢？更有甚者，郭先生把宋代禪宗的五部「燈錄」中，有四部都是以皇帝的年號命名，也作爲表明佛教階級性的論據。這種分析方法已近於荒唐了。對佛教平生的社會歷史根源，我們必須作深入的實事求是的研究，而不是凭着一氣痛快淋漓的漫學所能解決問題的。當然，郭先生的幾本書，在資料上花了大量的功夫，在這方面還是有其存在價值的。

（完）

（上接第13頁「由明初兩位皇帝的崇佛談到『佛學』與『學佛』」）
執，不肯附降而被殺，臨刑時慷慨曰：「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惟其義盡，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行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歷代讀聖賢書者多矣，而能爲聖賢如文天祥之成仁取義者，爲數甚稀。同樣，世人研究佛學者多矣，而學佛者甚少，成佛者則更爲稀罕。蓋雜染心一日未除，則無論其佛學如何高深，終不能得般若之旨及進學佛之途，甚至有「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語出《老子》）之傾向，至於成佛則更不可論矣。（完）

註釋

①釋幻輪：《釋氏稽古略續集》（著於明天啟七年【一六二七】）卷二。上海世界書局「佛學叢書」影印原刻本。一九三三。廿三頁。

②同①卅二頁。

③明太祖濫殺之綜述，見吳昌碩：《朱元璋傳》，三聯書店，北京，一九六五。

④明成祖施族刑之綜述，見商傳：《永樂皇帝》，北京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

⑤明成祖自編的《金剛經註解纂輯》，不見於《明史·藝文志》。現存永樂廿一年（一四二三）刻印的《御制金剛經集註》（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卷首有成祖自序云：「間閱諸編，選其至精至要經旨弗違者，重加纂輯，特命鋟梓，用廣流傳。」據此，則此書即成祖之《纂輯》。

⑥熊十力：《摧惑顯宗記》，台灣學生書局重印，台北一九八八。一一頁。

⑦近年香港及台灣均出現偽宗，以台灣尤多。此等偽宗之綜述，見陳慧劍：《二十世紀末期台灣『附佛法外道』之興起》，載《法燈》九三期（一九九〇年三月），佛教法住學會，香港。